



FDS

Frontiers of Discourse Studies

FDS, Vol. 1, No. 1, 2026, pp. 137-147.

Print ISSN: 3106-809X; Online ISSN: 3106-810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fd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fds260112nlphg>



非纯粹语言实践：朗西埃语言观中的历史性缺失

王瑾妍 (Wang Jinyan)

摘要：本文以雅克·朗西埃的语言观为切入点，聚焦其所呈现的“非纯粹语言实践”及其潜在的历史性缺失。朗西埃将语言理解为一种实践，强调语言在反映现实处境与扰乱共识秩序中的作用。然而，其理论框架仍主要处于共时视角，较少关注语言实践与具体历史脉络的关联，从而在历史性维度和主体能动性方面显得不足。文章通过系统梳理朗西埃的语言实践观，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中的实践理论，分析其与历史性实践之间的张力与空白。研究指出，非纯粹语言实践不仅揭示了朗西埃语言观在处理语言、主体与现实关系上的局限，也提示语言实践不应仅受制于结构性条件，保持历史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平衡。这一视角为深入理解语言、主体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

关键词：语言；实践；雅克·朗西埃；历史性

作者简介：王瑾妍，博士生，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文化理论。电邮：812944067@qq.com。

Title: Impure Language Practice: The Historical Gap in Rancière's Conception of Language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Jacques Rancière's conception of language, focusing on the "impure language practices" and their underlying historical deficiencies. Rancière understands language as a form of practice, emphasizing its role in reflecting concrete realities and disrupting consensual orders. However, 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predominantly operates within a synchronic perspective, paying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inguistic practice and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s, which limits its historical dimension and the

agency of the subject. By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Rancière's theory of language practice and juxtaposing it with Marxist and Maoist conceptions of practic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tensions and gaps between Rancièrian language practice and historical reality.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impure language practices not only reveal the limitations of Rancière's framework in address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language, subject, and reality, but also indicate that linguistic practice should transcend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embrace historical specificity and diversity. This perspective offers a novel theoretical pathway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 interplay between language, subjectivity, and history.

Keywords: Language; Practice; Jacques Rancière; Historicity

Author Biography: Wang Jinyan,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cultural theory. E-mail: 812944067@qq.com.

引言

结构主义通过封闭语言符号系统架空感性经验和具体历史，将宏观社会、微观个体都纳入语言结构的内在机制之中。个体所思所感所行，被视作结构之内的回响；主体的自我理解与行动选择，被还原为符号系统赋予的主体性要求。面对这种结构的全景式统摄，朗西埃创造性地以“实践—语言”的辩证关系重构理论框架，他认为，语言不仅反映现实，而且能够以现实为基础提出“歧义”以检验和修正认识，如此语言既不仅仅是交流的媒介也不是本体原初，而是实践的特殊形式，既嵌入现实，又能革新现实。在此观点下，主体不再是语言结构预设的抽象身份，而是在语言实践中诞生的具体存在。

这种语言实践的观点虽然突破了结构主义的困境，也避免了反结构主义造成的意义消散，提供了对“具体情境”的有益思考，但它的运作并非建立在历史积淀与演进的基础之上，而是突发于“共时”的时间逻辑中。“共时”造成了语言实践的“事件”特征，在当下现实情境中重新分配感知、重塑言说规则、打破政治主体性，不存在必然要遵循的历史惯性。

但当我们回顾“实践”的概念，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语境下的毛泽东思想，实践始终与历史性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中人的能动性只有在历史条件中被“物化”为实践，才能成为历史性力量。《实践论》则认为人的能动性通过实践认识和改造世界，它总是在历史条件中展开，并反过来推动历史发展。历史性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回溯，它更是在过去、现在、未来多个维度上的时间延展，是语言作为实践、展现主体能动性的必然结果。因此，缺失历史性的朗西埃语言观虽然带有强烈的实践特征，但是与真正的语言实践尚有距离。

一、朗西埃语言观中的实践面向

理解朗西埃的语言实践观之前，首先需要厘清“语言实践”这一思想关切的发展脉络。它并非从一开始就与朗西埃的理论紧密相连，而是在不同思想传统中不断被重构的。通过回顾语言实践的形成与发展，我们能够看到它在理论上所承载的可能性与局限性，而正是这些脉络，让朗西埃的视角显得尤为独特——他不仅关注语言如何运作，更跳出语言本身，强调语言在个体感知和现实处境中的实践张力。回溯语言实践有助于理解朗西埃对这一关切所赋予的新意，进而把握其理论的深度与价值。

(一) 回溯语言实践

“语言实践”在西方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作为系统化的独立术语，但不乏与之相关、可供追溯的思想路径。最贴近这一概念的无疑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1995，p.34)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视角中，语言从未被当作一种中立的符号系统来看待，它在具体的物质交往中逐渐发展起来，是一种嵌入现实关系、社会矛盾和历史斗争之中的实践行为。但是在语言具有“实践性”这一关键论断之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未深入探讨语言自身的结构与运作机制。这一理论空白，在哲学语言学的潮流中被福柯、德里达等人以“话语”的方式延展，阿尔都塞也借由“询唤”强调了语言在主体建构中的角色。但是，这些理论虽然揭示了语言与权力之间复杂的关系，却并未真正坚持实践的出发点，反而通过历史、意识、符号本身使语言结构成为主导现实与主体的决定性机制，重新陷入了某种理论的封闭之中。

返回哲学语言学转向的重要节点，与索绪尔同时期的维特根斯坦对语言与行动的关系做出了突破性描述，他在《哲学研究》中提出“语言游戏”概念，“语言的诉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维特根斯坦，2000，p.17)“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p.31)这一理论开启了从结构走向“行”的语言理解方式，为后续诸如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布迪厄的“语言资本”、以及当代政治哲学对语言能动性的探讨，提供了理论基础。最容易与语言实践混淆的莫过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实则“行为”和“实践”存在本质差别。奥斯汀(1962)认为，语言并非仅仅传达信息或陈述事实，说出某句话本身就是在做某事。然而，中国学者顾曰国(2012)评价奥斯汀的“言语行为”更像是一个自足的执行程序——在既定的社会规则框架中，话语一旦发出，行为即刻成立，却鲜少回溯到言说者与听者在实践过程中的互动与权力协商。同样受维特根斯坦影响的布迪厄将语言视为权力斗争的场所，并通过“场域”“惯习”与“象征资本”等概念揭示语言生成的社会机制。布迪厄认为语言并非在中性或均质的语境中运作，而总是嵌入具体的社会位置、权力关系与象征秩序之中，言说的效果依赖于场域结构中的“承认关系”。(Bourdieu, 1991, p.66)布迪厄在社会学层面的批判使“语言实践”真正触及结构性不平等问题，但正是这种对语言资本化的强调，让语言又陷入了德里达所谓的“概念循环”，语言权力关系的再生产和象征暴力的隐形运作本质上还是一种形而上的结构决定论，而围绕概念的一系列讨论必然缺乏突破概念本身的潜在空间。

真正让语言走出概念的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他不再将语言视为观念本身的流变，而是将其理解为权力运作的机制。在福柯的视角下，语言不仅反映现实，更制造现实。它通过区分什么可以被说、什么必须沉默，从而深层地建构了人对自身与世界的感知方式。通过一系列划分、命名、分类的机制，语言获得了权威性，并参与到现代社会的各个规训系统中。语言这种不断被制度塑造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被自然化为“原初”的媒介，获得了“当然如此”的合法性。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种悖论：语言作为制度历史的产物，却因其在社会运行中的普遍嵌入，而被反向确认为个体存在与社会运行的“原初条件”。语言在此既被“历史化”，又被“自然化”，最终构成了一个无法逃逸的框架。

从维特根斯坦到福柯，现代思想在语言问题上的理论路径经历了从静态结构到动态关系的深刻转向。人们看到语言并非中立媒介，而是始终处于社会秩序与权力运作之中。然而，尽管这些理论强调语言的“行动性”和“发生性”，它们始终未能真正赋予个体在语言中的实践主体地位。无论是结构中的语言行为、语言市场中的说话资格，还是权利话语中“可被说”与“不可被说”的划分，这些理

论展现的都是语言如何设定主体的位置、限定主体的可见性与可听性，而非主体如何通过语言展开实践、介入现实、创造可能性。

以“观念”为核心的西方哲学传统，以及1960年代走向极致的结构主义思潮，在理论上几乎彻底否定了个体的能动性，反而六十年代进入西方的毛泽东思想为其带来了新的可能。1964年中法建交后，毛泽东思想中的“群众路线”“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思想改造”等理念，被部分法国左翼视为一种能够突破意识形态僵局、真正赋予群众以政治能动性的思想资源。朗西埃曾说：“我当时就认为，在革命中，必须像毛泽东那样，相信群众的能力。”(陆兴华，2013，p.72)毛泽东的思想打破了理论与实践、知识与经验之间的断裂，也使语言不再是一种由结构设定的符号系统，而成为介入现实、激发行动、锤炼思想的过程。朗西埃在其影响下将实践从理论中解放出来，从实践本身出发，不再探讨有关语言的哲学分析，而是解释实践如何在当下的语言问题中具体展现，在真正的政治实践中展开的语言思考。

(二) 朗西埃的语言实践观

语言是朗西埃政治、美学工作的重要支点，也是他重新理解现实、语言与主体之间关系的基础机制。但由于“语言转向”在20世纪西方理论界的深远影响，研究者往往将朗西埃的语言问题套入结构主义的框架，将其简单的理解为结构语言 (*la langue*) 与具体言语 (*la parole*) 之间的张力。(Ross, 2010; 王建辉, 2021) 这种论断虽然符合当下西方语言-言语冲突的理论趋势，但也在无形中缩减了朗西埃在语言实践方面的视域。

首先，朗西埃所说的语言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语言结构。语言虽然作为朗西埃理论运行的核心，但他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并不以语言本身为最终根据，言语对语言结构的破坏并不是仅凭抽象关系就能够实现。朗西埃认为：“人之所以思考，并不是因为他讲话，如果那样认为，恰是让思想服从现存的实质秩序。人思考，是因为他存在。”(Rancière, 1987, p. 105) 朗西埃对意识、意识形态(秩序)、现实做出了区分，语言是人基于现实活动对自身所思的表达，无论是语言结构还是言语都需要以现实为前提，也不能脱离人的现实处境独立存在。因为现实，语言能够产生于意识但又能够不同于意识形态，二者之间的不对等所依据的并不是符号系统内部的无限差异，语言之所以具有打破秩序、重构感知界限的政治力量，恰恰是因为它始终扎根于现实的分布与矛盾之中。语言的歧义不是逻辑系统的裂缝，而是现实中主体间感知分配失衡的直接体现。正是在这一点上，朗西埃给出了语言能够作为实践的核心要素——现实，明确语言不是脱离现实的抽象机制，而是参与现实生成的实践场域。立足现实的基础，朗西埃得以进一步探讨语言对秩序的打破与重构。

朗西埃的语言实践观由反映现实的语言和“歧义”组成，它们共同属于以现实为基础的语言整体。他首先否认了语言可以作为自足世界的判断：语言结构与知识—社会结构的类比对语言本身的限制，它使语言成为了一种纯虚构的知识，除了预设他人无知并在思想中不断加固这种由语言结构差异演变而来的社会秩序不平等外，别无他物。(p. 38) 显然，语言还包含以其为载体更加根本的、基于现实实践的具体知识，用朗西埃 (p. 65) 的话来说：“语言的物质理想性反驳了劳动者与思想者间的等级划分，[.....]任何一种语言成果，都以同样的方式被人理解和实现。”源于实践的语言总是含有个体的切身体验，它让我们忽略了语言结构与社会秩序共同造就的不平等，专注于用实践的方式回归语言本身。在这一点上，实践的语言不仅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平等的，而且也是达成真正理解的唯一方式。

在确定语言同时作为现实和对现实的反映之后，朗西埃才提出“歧义”回应固定在词句中的共识和变动的现实之间始终存在的差异。朗西埃对共识的理解容易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混淆，但实际上，这种共识更接近毛泽东（1991）所说的“认识”，即“某一发展阶段内”获得的认识需要回归实践，不断在实践中修正以符合客观现实，共识是在语言结构中凝结的对过往实践的普遍认识，虽然它表现出与意识形态相似的稳定状态，但共识既超越了完全抽象独立的语言结构也不是意识的绝对生产者。它需要通过与现实之间的“歧义”，在语言结构中用具体现实不断更新自身。“歧义”指个体通过表达有别于社会秩序、文化共识的切身体验，形成交流双方同时理解又不理解一件事情的情境（Rancière, 1995），这种源自切身体验的语言中断了语言结构的运行，从而开辟出一个悬置秩序的空间。如果没有语言的现实来源作为铺垫，“歧义”很容易被看作解构理念指导下纯粹的“构成性”概念，它在破坏共识之后无力给出社会运行的新图景。因此，“歧义”的基础是稳定社会共识和变动的具体现实，包括语言结构在内的所有前规则、个体当下的体验都平等地参与到“歧义”创造的交流空间中，进行感性的再分配。

“歧义”中的共识之所以能够与个体切身体验产生冲突，就在于它们都是个体的现实处境。因此，我们无法在语言结构的抽象与具体之间做清晰的划分，也不能将它与个体表达完全对立，无论是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结构还是语言所承载的既有认识和当下反思，在它显现的一刻，就是反映现实、开启“歧义”的语言实践。因为实践，朗西埃确信语言在结构形式之外同样具有实质性，这种实质性让语言所造成的“歧义”从根本上有别于当下所流行的解构主义方法。语言不会像德里达（1967, p. 410）所说的那样在无限的延异中丧失意义，而是在实质和结构间维持了一种消解的尺度，即否定不平等的结构秩序，但保留人与人之间理解、共通的可能。相比之下，那些完全被语言结构所固定的知识、真理都只是对语言整体的阉割和遮蔽。

虽然语言中的结构无法避免，但人类依然能够在“说出”语言的实践中走向未来。也因如此，即使抛开时间维度上现实的变化，处于实践之中的朗西埃也不能用语言来固定任何具有实意的共通。但这并不是说共通不存在，朗西埃（1987, p. 124）明确表达过：“我们说人们可能平等。我们提出这个主张，并想跟同样这样认为的人一道去检验它。正是基于这个可能，人的社会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共通不再依赖语言，“歧义”中产生共通的可能性与实践相关，它需要个体在现实的切身体验中获得构建共同体的根本依据。

二、语言实践中的共时与历史

讨论语言实践时，时间的维度总是不可回避的。受语言学影响，西方思想中呈现出结构性的“共时”视角，而朗西埃则试图将语言结构与具体实践、主体经验相连。即便他通过现实填充共时来弥补结构的局限，缺乏历史性仍使其成为突发的“事件”，人的能动性无法作为稳定存在的生成动力。因此，考察厚共时的限度与历史性的必然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在历史性中，语言实践的张力和个体的能动性才能充分展开，使理论超越对结构的单纯描述，指向创造与延续的可能。

（一）共时与厚共时

朗西埃语言实践观对于结构主义的回应并非简单地恢复某种“真实的历史”，而是通过重构语言实践的时间维度，在不同社会阶段、历史情境的并置中重启个体与现实之间的感知关系。在他看来，语言的政治性恰恰在于它同时具有内部的自治逻辑和与逻辑完全异质的现实性，其间的张力使原本

不被看见、不被听见的经验有能力言说。因此，朗西埃的语言实践观带有明显的“共时”特征，这也是当代西方思想在朗西埃理论中留下的痕迹。20 世纪中叶，以索绪尔语言学为基础的结构主义思想在法国兴起，迅速扩展至人类学、精神分析、政治哲学等诸多领域，成为理解社会与文化现象的主导范式。其理论基础之一，即语言的“共时性”概念，主张应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切片中将语言视为封闭系统来加以分析，而非追溯语言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一视角将语言中的意义关系还原为能指之间的差异，使语言成为排除偶然性与历史波动的静态结构。正是此设定下，结构主义不断将语言系统抽象化，并使其具备一种理论上的普遍性。其后的列维-斯特劳斯将神话还原为一种语法结构，揭示其中的变换规则；拉康借索绪尔建立起无意识的能指系统，宣称“无意识是被语言结构化的”；阿尔都塞进一步将意识形态理解为语言结构询唤主体的过程。这些理论的共同点在于，将语言内部的结构视为一切社会机制与主体机制的原点，现实的多样性和经验的具体性则退居其次。

不少现当代思想家对此提出批判，如前文提到的德里达曾指出结构主义依赖某种隐秘的语言“中心”观念来维持其稳定性。这种逻辑虽然摧毁了“在场形而上学”的传统图景，但它并没有真正打破语言与现实之间的结构性隔阂。语言仍是对现实的取代，而不是与现实共生的机制。在此意义上，共时性成了一种冻结现实的方式：它将结构设定为始终有效的解释框架，而主体是被安置在框架中的固定元素，经验转是可被翻译的差异形式。这种逻辑虽然提供了高度凝练的理论工具，却不可避免地使现实变得“失语”。相比前人，基于具体现实处境的语言实践虽然也讲“共时”但却更加具有“厚度”¹。虽然朗西埃参照德里达的解构逻辑，用现实处境中的语言“歧义”来打断抽象语言结构对社会秩序的宰制，但他并未放弃对语言结构的承认。结构不是应当被瓦解的对象，而是现实的重要组成。在朗西埃那里，歧义的语言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说话者的实践语言总是处于一个与语言结构之间的张力关系中：语言结构设定了可被说出的范围，而说话者的现实处境往往超出这一设定，使得语言整体出现裂缝。这种裂缝就是歧义发生的场所。

基于此，朗西埃语言实践中所展现出的“厚共时”旨在依靠现实处境与语言之间的张力拉开一种非线性、非结构的时间场，在这个时间场中，感官被重新分配、言说规则被重塑、政治主体性呈现开放的状态。正因如此，朗西埃的语言观才具备实践面相，他在“厚共时”的维度中展开了一个抛开语言结构定义、在语言实践中不断裂变与重新组织的共同体概念。朗西埃在多个场合中强调语言“现实性”本质，尤其体现在他对政治和治安关系的描述之中。通过语言，政治实现了对治安的扰乱，让现实中“无分者”打破既定感性分配。《歧义》有言：“政治使原本没有场所、不可见的变成可见；使那些曾经徒具嘈杂噪音的场所，能够具有可被理解的论述；它让原本被视为噪音的成为能够被理解的论述。”(Rancière, 1995, p.53)这意味着，语言能够推动实现其本身所具备的现实特征：它能够撕开共时结构的平面，引入原本不被允许出现的时间与主体。

朗西埃提出的“主体化”正是这一扰动在语言层面上的组织方式。他从不将“主体化”中的主体视为在语言结构中被赋予稳定的身份，虽然这种主体在社会秩序的框架中确实处于一个在语言中打断秩序分配、制造不一致性的位置，但是这不是对主体的指认，而是现象本身。由于语言包含了说话人当下想要表达的现实处境和作为现实组成部分的社会共识和语言结构，主体在行动的当下就注定

¹ “厚度” (la épaisseur) 一词借鉴梅洛·庞蒂的《可见与不可见》，梅洛·庞蒂用它来反对语言结构主义“平面化现实”的倾向，与朗西埃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参考文献：Merleau-Ponty, Maurice. (1964). *Le visible et l'invisible*. Gallimard. p. 176.

了两种共在的时间：长期共识的线性时间和当下现实的爆炸时间。主体的可见，不是语言赋予的，而是它穿越稳定的共识结构，在新的时间维度中被点亮。这才使得朗西埃的“共时”时间逻辑，具有不稳定、异质与重组的特性——一种结构内的非结构时间。

无论是语言本身还是“主体化”的过程，朗西埃都在构造一种不依赖线性时间展开的时间逻辑。在他看来，语言的“现在”虽然不用回应宏大的历史，但也并非一块静止的切片，它始终作为一个扰动结构的‘非历史演进的时间厚度’存在。朗西埃的语言实践观在结构主义“共时性”范式内部制造了松动与偏移。通过凸显语言中的事件性断裂与现实介入，他打破了结构语言学中“共时性”所蕴含的封闭与自足逻辑，使共时性获得了生成性与行动性。语言不再是指向意义的静态通道，而是主体与现实交汇的场所——它携带着冲突、扰乱、失败与异质的时间感知。“厚共时”正是朗西埃语言理论中的实践张力所投射出的结果，它不是一个事先命名的理论概念，而是其方法论路径在运作中自然展开的时间形态。在这一层面，语言实践既体现为对结构规则的内在扰动，又指向主体如何通过语言裂缝将自身嵌入现实之中。这种共时性既非纯粹结构性的共现，也非历史时间的累积，而是一种在言说中出现、在断裂中延展的“现在之重”。它揭示了朗西埃试图通过语言开启政治空间的努力——唤起现实中不断被遮蔽、又不断浮现的主体验证。

（二）厚共时限度与历史召唤

与此同时，朗西埃的理论也显现出其难以逾越的问题：语言实践再扰乱当下的过程中，仍然主要依赖“现在”的时空逻辑，其突破结构主义的关键手段——事件与歧义——往往发生在静态时间中被激活的瞬间。这种对“现在”的强调使得朗西埃理论更适合描述感性秩序中的突变与间隙，却难以描绘社会历史中权力积淀与认知惯性的长期形成过程。简言之，朗西埃构建的“厚共时”确实为语言与现实的关联打开了新的路径，使语言不仅成为秩序的组成部分，也成为抵抗秩序的实践机制。但这一机制是否足以支撑对复杂现实的深度介入？其共时性如何转化为真正的历史维度？正是这一未竟的张力，为我们重返对历史性问题的深层反思提供了理论坐标与问题线索。

尽管“厚共时”成功地打破了结构主义的抽象共时，还原了语言本身在实践层面所具备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它仍然无法解决实践的历史性缺失。实践的历史性并非单纯地将不同时间段的社会情境并列，而是要承认历史中语言实践的延续与积淀作用。我们不仅需要思考语言实践如何在特定的时空中显现，还要探讨这些显现如何随着历史的推移积累、演变，形成具有延展性的政治行为并最终积蓄成为下一次显现的内在力量。因此，尽管“厚共时”的概念具有理论价值，但这些显现依然是突发性的、即时性的事件，它依赖声音的震动、肢体的行动。这些被视作事件，“可看”“可听”的言行暗中对实践进行了知与不知的划分，只有这些言行出现时，我们才认为个体能动性存在、政治在发生。

但是，朗西埃语言观所证明的个体能动性显然不是跟随政治显现的片段。朗西埃深耕工人档案是为了通过他们的行动和话语突破结构限制，恢复个体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恰恰是为了摆脱语言的束缚而在人自身持存。换言之，朗西埃虽然用语言证明了个体能动性的存在，但个体能动性却是先在的，它不应被语言切分，也无法回避历史性。在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实践概念中，历史性是核心维度。马克思（1995，p.6）在《费尔巴哈提纲》中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不仅强调实践的能动性，更体现出实践的历史性——实践不可能孤立存在，它总是在具体社会、经济和历史条件中展开。实践既体现人的能动性，又受制于社会结构与

物质条件，因此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换句话说，个体的行动不是瞬时的孤立事件，而是在社会历史脉络中产生作用、被社会条件制约并反过来改造这些条件的连续行为。历史性保证了实践不仅是显现的行动，更是历史生成过程的一部分，使得个体能动性和社会结构之间形成动态的互动与张力。

毛泽东 (1965) 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实践观。他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不仅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础，更要求个体在行动中对历史条件和社会局限进行反思。毛泽东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模式，强调实践的历史性和反思性，即实践不仅是行动本身，还包括个体对社会条件、历史环境以及行动后果的认知和调整。历史性在这一体系中，不仅体现为时间的连续，还体现在对具体条件的反思和改造能力。这种视角下，个体能动性与历史性是辩证统一的：能动性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而孤立存在，而历史性又依赖于能动性在具体实践中的体现，从而形成完整的实践。

相比之下，朗西埃语言实践中的个体能动性依赖于显现本身，而非持续的历史性进程。这种处理方式忽略了能动性与时性之间的必然联系：个体能动性不应仅仅在事件发生时才“显现”，而是作为历史性实践的连续力量始终存在。朗西埃的语言实践虽然捕捉了能动性的片段，但缺少对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的分析，因此它的实践仅仅符合了部分的实践特征，是非纯粹的。此外，这种非纯粹性还体现为理论上的局限。语言实践的事件性被凸显，历史性被削弱，导致所谓的“个体能动性”在理论上呈现出悬浮状态，失去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反观社会现实和理解历史进程的基本理论价值。

三、非纯粹实践思辨

朗西埃语言实践观所强调的个体能动性，是主体能够在语言实践中显现自身的行动能力。然而，这种显现虽然证明了个体能动性的存在，却无法单独构成完整实践的理论基础。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承认实践就是承认历史性的存在。历史性并不是宏大叙事的代名词，也不是对个体行动的压制，而是一种逻辑必要性：它为个体行动提供理解和判断的维度，使每一次显现能够在时间与社会脉络中获得理论意义。如果缺乏历史性，行动显现将停留在表层事件，无法在理论上形成连贯性和解释力。历史性不仅为个体能动性提供合理性，也是将行动纳入完整实践的前提。

个体能动性在先，而历史性为其提供合理性与连续性。个体实践所产生的事件不可否认，它体现了个体在特定语境中的判断与选择。然而，如果这种显现脱离历史性，就无法解释其社会意义或后续影响，也无法在理论上理解行动与社会关系的互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出，实践本质上是人与社会、人与物质世界互动的历史过程，每一次行动都是历史条件下的反应与调整。(马克思, 1995, p.3)毛泽东 (1965) 的实践理论同样强调，主体必须认识并反思客观条件，通过实践检验自己的行动。在此逻辑下，历史性为语言实践积淀共识，一方面使实践能够在理论上形成连续性与可解释性，避免陷入孤立的事件碎片，另一方面作为完整实践概念的起点，等待并承托个体能动性的显现。

历史性的缺失动摇了个体能动性的存在，这不仅是抽象理论问题，也直接影响对现实中沉默与不作为的理解。它们究竟是特定历史与社会条件下个体的能动选择，还是通过语言实践走向了能动性的反面？缺少历史性，我们无法在理论上把握这些选择的合理性，也无法理解行动如何在社会结构中产生意义。那么恢复个体能动性的意义何在？自发的集体、自由的共同体在许多朗西埃的研究者心中存疑。(郑海婷, 2021; 王福生, 2022; Karaliotas, 2023; 饶静, 2022; 李长生, 2020) 当历史性缺失时，行动虽存在，但其意义和动力被切割开来，无法形成逻辑闭环。这种批判不仅指向朗

西埃语言实践的局限，也为更广泛的社会理论和语言哲学提供分析尺度，加入了理解个体沉默与不作为的可能。

实践的不纯粹并非要彻底否定朗西埃试图恢复的个体能动性，而是指出高举事件的理论风尚无法独立构成完整的实践，也会造成对实践概念本身的束缚。对实践的非纯粹批判促使实践分析突破对局部事件、行动的描述，转向将具体行动、历史积淀、共识结构统一考量的分析框架。通过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将视听言行之外的沉默和不作为纳入思考，并评估其在社会和历史网络中的位置。非纯粹实践厘清了行动显现与理论完整性之间的边界，指出了朗西埃事件性语言实践的理论空白，并提供可操作的分析方法。它既保持了个体能动性显现的即时张力，也确保实践在理论上成为自治和完整的概念。

当下的西方理论在分析语言实践或个体能动性时，往往倾向于回避历史性的问题。例如，阿甘本 (1998) 强调生命政治中主体的事件性显现和即时反应，侧重分析突发事件及其法律、政治机制的关系，而对这些事件如何嵌入更广泛的历史脉络关注不足；巴迪欧 (2005) 在《存在与事件》中，则将事件视为主体信念和真理的激发点，关注事件本身的发生及其对主体的瞬时影响，却较少讨论事件与历史连续性的结构性联系。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西方当代理论受到结构主义和事件化思潮影响，更重视主体的表现、差异与偶发性；另一方面，历史性常被误解为宏大叙事，理论家们担心这种叙事会掩盖事件的独立意义，从而在方法上淡化了历史维度。

然而，历史性并不会削弱个体能动性的存在，因为实践所指向的历史性并非抽象的、超脱于具体现实的存在，而是来源于具体条件，并通过实践返回具体之中。马克思 (1995)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西方以往排除个体与现实生产生活的历史观，他认为人是具有意识的，而且意识从来不是纯粹的意识，它总是与物质纠缠。马克思并非简单地将历史视为物质条件的产物，而是强调人类通过实践活动，能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改变自身的社会状况，推动社会变革。虽然历史条件、物质基础等因素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某种框架，但历史并非完全由这些条件决定。相反，历史中个体与集体的能动性，是推动历史进程的核心力量。而在毛泽东 (1965) 的《实践论》中，实践始终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个体在具体社会条件中进行选择，其行动既反映对历史条件的理解，也通过实践不断影响条件本身。换言之，个体能动性始终存在于历史性之中，历史性为实践提供展开的可能性和条件。实践的历史性与个体能动性之间形成辩证统一，使其具体而连续，同时又能在历史条件中自由展开。因此，历史性与个体能动性的统一不仅体现了实践的内涵，也为理论分析提供了坚实基础：每一次行动、沉默或不作为都可以作为历史网络中的节点；每一次显现都既承载着主体的选择，又反映着历史条件的制约。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已经回应了朗西埃等当代西方思想家所困扰的结构主义问题。首先，结构主义倾向于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决定作用，认为个体的行为和选择被深刻嵌套于更大的社会系统之中，而缺乏与历史间直接能动的联系。但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结构是先在且一成不变的，相反，无论最终人们如何建立社会的共识秩序，社会的发展与历史的进程都直接根植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之中，“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时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有专门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 (马克思, 1995, p.34)。在此基础上，生产活动、社会交往和实践选择中的个体行动既反映历史，又塑造历史，由此才能形成连续而具体的历史

进程。每一次劳动、交流或集体选择都是历史的具体体现，正是这种具体性，使历史性既不是抽象的也无法远离个体成为某种“神的安排”。

据此，历史性并不会削弱语言实践观所强调的“厚共时”。相反，历史的积淀与延续性为语言实践提供了更为深刻的维度。语言不仅在当下发生作用，它的意义和功能始终嵌入历史的进程中，每一次表达或沉默都承载着过往实践的经验，同时为未来实践提供可能。通过这种嵌入，语言实践在历史的流动中不断开放、演变、延续，并逐渐形成新的社会共识。正因如此，语言实践需要兼顾突发的事件与历史的延展。历史性的补充为语言实践提供了理论深度，使我们能够从长期的历史视角审视语言的作用和意义，而不是将其孤立于偶发事件或抽象系统之外，从而真正对当下结构和语言的问题做出回应。

四、结语

通过对朗西埃语言实践观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呈现的个体能动性虽然在事件中得以显现，但这种语言实践忽略了其与历史条件、时间维度的内在联系。个体能动性不应仅依赖显现而存在，它本身包含历史性潜能，这一点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实践观中得到了系统阐释：实践作为历史性连续行为，既体现人的能动性，又始终嵌入具体的社会现实与历史脉络之中。

由此，本文提出“非纯粹实践”概念，不仅是对朗西埃语言实践观的批判，也是对语言实践理论本身的思辨拓展。非纯粹实践反映了缺乏历史性的语言实践在事件性和历史性之间的张力，使我们能够更精确地分析语言实践的构建与局限。任何对语言实践的理解，如果忽视历史性及其与能动性的辩证关系，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片段化和非纯粹化的局面。完整的语言实践不仅在于可听可见的话语和行动，更在于连续的实践中体现个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对语言实践的反思只有兼顾事件性与历史性，才能回应语言符号封锁下实践的本质及其理论意义。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Wang Jinya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3-6086-3836>

References

- Agamben, J.(1998).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Austin, 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adiou, A. (2005). *Being and Event*. Continuum.
- Bourdieu, P.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translated by G. Raymond and M. Adam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errida J. (1967).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Seuil.
- Karaliotas, L. (2023). "Infrastructures of Dissensus: Repartitioning the Sensible and Articulating the Political through the Occupation of Greece's 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Politics and Space* (07): 1-19.

Rancière, J. (1987). *Le Maître ignorant: Cinq leçons sur l'émancipation intellectuelle*. Fayard.

Rancière, J. (1995). *La Méfentence: Politique et philosophie*. Galilée.

Ross, A. (2010). "Expressivity, Literarity, Mute Speech." In Jean-Philippe Deranty (Ed.), *Jacques Rancière: Key Concepts*. Routledge: 134-135.

奥斯汀 (2012): 《如何以言行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Austin, J. L. (201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李长生 (2020): “法国后马克思主义的‘双生花’——论阿兰·巴迪欧与雅克·朗西埃的美学分歧”。《中外文化与文论》(01): 372-393。

[Li Changsheng (2020). "The 'Twin Flowers' of French Post-Marxism: On Alain Badiou and Jacques Rancière's Aesthetic Divergence."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01): 372-393.]

陆兴华 (2013): “自我解放: 将生活当一首诗来写——雅克·朗西埃访谈录”。《文艺研究》(09): 71-79。

[Lu Xinghua (2013). "Self-Emancipation: Writing Life as a Poem—An Interview with Jacques Rancière." *Literary Research* (09): 71-79.]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9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Marx, K and Friedrich Engels (1995). *Col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3). Beijing: Editorial Board for the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毛泽东 (1965):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Mao, Z. (1965).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Vol. 1).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饶静 (2022): “拜物教与批判逻辑——朗西埃的批判观念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02): 179-187。

[Rao Jing (2022). "The Fetishism and Critical Logic: An Interpretation of Rancière's Concept of Critique."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02): 179-187.]

王福生、潘昕培 (2022): “智力解放、教学化社会与作为起点的平等——朗西埃<无知的教师>解读”。《哲学动态》(07): 27-36。

[Wang Fusheng, Pan Xinpei (2022). "Intellectual Emancipation, Pedagogical Society, and Equality as a Starting Point: An Interpretation of Rancière's *The Ignorant Schoolmaster." *Philosophical Trends* (07): 27-36.]

王建辉 (2021): “从空洞的主体到具身的主体——朗西埃论政治主体性问题”。《世界哲学》(05): 19-29。

[Wang Jianhui (2021). "From Hollow Subject to Embodied Subject: Rancière on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Subjectivity." *World Philosophy* (05): 19-29.]

维特根斯坦 (2000): 《哲学研究》, 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

[Wittgenstein, L. (2000).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lated by B. Lou. The Commercial Press.]

郑海婷 (2021): “细节的政治: 分裂分析”。《学术月刊》(02): 160-169。

[Zheng Haiting (2021). "The Politics of Details: Analysis of Division." *Academic Monthly* (02): 160-169.]